

生育对女性就业和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

——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

屈小博 王寻喻

【摘要】文章利用 2023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使用事件研究法识别了生育对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动态效应,并从职业类型和职业技能需求的视角,实证分析了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影响,得出三方面的研究发现。第一,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生育早期的 0~3 年。女性的就业比例在其生育后 3 年内平均下降了 15 个百分点,在孩子进入学龄阶段后逐步回升,8 年后恢复到生育前 1 年的水平。第二,生育对受教育程度低、农村户籍、外地户籍及无隔代照料的女性带来的短期负面影响更大,但长期并无显著差异;对于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生育对其就业的负面影响在长期也无法消除。第三,生育使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劳动者更倾向发生职业转换,女性劳动者在生育后从事职业的非常规技能需求也显著减小,不利于其持续积累人力资本、应对新技术变革。文章的研究发现有助于从动态视角更深入地认识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为生育支持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女性就业 职业转换 “生育惩罚” 事件研究法

【作者】屈小博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研究员、教授;王寻喻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2022 年,中国人口总量开始出现负增长,标志着人口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人口总量转折深刻影响着发展格局。一方面,人口总量下降意味着新生人口不足以抵消死亡导致的总人口减少,正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均衡发展的一大主要风险。202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 1.3,低于国际社会所认为的 1.5 的警戒线,且下降趋势仍在继续。另一方

*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专项项目“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经济影响及政策研究”(编号:72141310)、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社会调查项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编号:GDGC2023022)的阶段性成果。

面,近年来,女性劳动供给快速下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由1990年的79%降至2020年的69%,降幅达10个百分点。女性劳动供给下降与生育密切相关,生育成本的上升使女性面临“生育—工作”抉择困境。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中国正致力于建立更完善的生育支持体系来降低女性生育成本,提升女性生育意愿。为科学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充分认识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动态影响,尤其是用更新的、更具代表性的数据来进行系统而细致的分析,从而为当前的政策改革提供更准确的理论和经验参考,这正是本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目前生育对中国女性就业影响的研究仍集中在静态分析,已有文献检验了生育对女性劳动参与、工资增长、就业歧视等方面(张川川,2011;贾男等,2013;刘金菊,2020)的影响。部分研究利用比较分析和生命历程视角描述性地说明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少数研究使用事件研究法进行了更明确的动态效应评估,但这些研究仍存在局限。第一,事件研究法在动态效应估计上的应用仍存在改进空间。部分研究因对女性生育的追踪样本较少等问题,其动态效应统计结果波动程度较大,未能揭示较为稳定的规律(杨凡、何雨辰,2022),而利用大样本的人口普查微观截面数据时,又需要引入较强的假设来模拟生育女性在非调查年份的缺失观测(Zhou等,2022)。第二,这些研究使用的数据较早,没有包含人口形势的新变化;近五年来中国的人口发展形势和生育支持政策都发生较大转变,但尚无研究使用最新数据分析生育对就业的影响。第三,已有研究较少关注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影响,尤其是在不同技能需求水平的职业间的转换,难以对生育相关的女性人力资本积累和长期职业发展提供更全面的视野。

本文利用2023年第五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5,后文简称CULS5)的最新数据,使用事件研究法识别了生育对中国城市女性就业的动态效应,并从职业种类和技能需求的视角,实证检验了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影响。研究发现,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生育事件的早期;相比生育前1年,在生育后的3年内女性就业比例平均下降了15个百分点,在孩子进入义务教育阶段而逐步回升,直到孩子8岁后才完全恢复。具体而言,生育对低教育水平、农村户籍、外地户口及无隔代照料资源的女性短期负面影响更大,但长期无显著差异。不过,对于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由于没有积累起有效的人力资本,生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在长期也难以消除。在职业转换方面,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的女性在生育后并未出现显著的职业转换,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不但更容易中断就业,而且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也更倾向于转移到其他职业。女性在生育后从事的职业非常规技能要求显著降低,这契合了生育后女性的就业需要,却不利于女性积累起应对未来职业发展和技术变革的人力资本。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利用2023

年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的工作历史信息,构建了较大样本的面板数据,并采用事件研究法(Kleven 等,2019)更准确地识别了生育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第二,本文使用了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的最新调查数据。考虑到大城市的经济压力、观念文化等因素,女性面临“生育—工作”间的抉择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实证研究得到的“生育惩罚”效应更具典型性和针对性。第三,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女性生育后的职业转换,尤其是从职业技能需求视角来进行考察,本文估计了生育对女性从事不同类型、不同技能需求职业的动态影响,更全面地揭示了女性生育后职业发展所遭受的冲击。第四,本文研究结论对优化女性就业、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二、文献综述

(一) 中国女性劳动供给的下降

女性劳动供给下降对社会整体的劳动参与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既有文献主要从微观层面对女性就业下降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早期文献认为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来自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教育水平、社会习俗、家庭照料等(Blau 等,2017),近来的研究则从工作性质、性别心理等更深层次分析了女性就业下降的原因。这些研究发现,由于家庭分工的需要,女性在就业时往往更倾向于边际劳动收入不变的弹性工作,男性则更可能选择边际劳动收入递增的非弹性工作(Goldin,2014)。由于性别之间竞争态度的差异,女性劳动者也会更少选择高竞争环境的职业(Flory 等,2015)。

对于近年来中国女性劳动参与下降的现象,有关文献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就业竞争加剧(Feng 等,2017)、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歧视(罗楚亮等,2019)、性别观念变化(Xiao 等,2020)等方面进行了解释。其中,女性生育养育行为起到的作用得到了大量文献的支持,詹鹏等(2021)综合考虑了多种影响因素,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发现,生育行为对女性的影响在2002~2013年开始显现,并随时间不断增大。鄢伟波和安磊(2021)利用2011~2017年的中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发现,女性在生育后的工作参与率降低了60%,但随着孩子年龄增大会逐步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 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

按照家庭经济学的理论,孩子被视为能带来效用的消费品,家庭成员在生育和就业之间的权衡可以借助“成本—收益”框架进行分析(Becker,1981)。对家庭而言,孩子可以为家庭提供劳动力、养老保障和情感寄托等方面的效用,同时也需要支付直接成本并承受因此挤出有偿劳动的机会成本。因此,生育对女性就业有双重影响:一方面,照料时间投入会抑制女性就业;另一方面,孩子的支出需求也可能促使女性增加就业。从家庭外的养育服务来看,完善的社会养育支持和更低的市场养育成本能显著提高女性的生育

意愿和就业水平(石智雷、王璋,2023;黄乾、范子昂,2023)。

现有实证研究表明,生育对女性就业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也被称为女性的“生育惩罚”。虽然养育孩子所需要付出的时间投入并不一定完全由某一性别来承担,但传统家庭观念往往赋予女性照顾孩子的职责,从而对女性就业造成负面冲击。其一,生育会导致女性劳动供给的下降(张川川,2011),包括退出劳动力市场和缩短劳动时间;其二,生育对女性工资收入(贾男等,2013;於嘉、谢宇,2014)和职业晋升造成负面影响,这可能源于生育导致的雇主歧视(刘金菊,2020)和女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Angelov等,2016)。

不过,上述研究主要从静态视角展开分析,关注的是生育在某一时点对女性带来的影响(杨一纯等,2023),忽视了时间维度的动态变化。为更清晰地说明生育对女性就业变动轨迹所产生的影响,一些研究利用追踪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期比较,如张抗私和王亚迪(2021)按照子女年龄分组后发现,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孩子0~2岁这一时期。还有一些研究采用生命历程视角,认为个体过去的发展轨迹会影响未来的发展轨迹(Abbott等,1990)。从这一视角出发,杨一纯等(2023)使用2014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即CHARLS)构造生命史数据,采用序列分析发现,虽然女性生育后短期内回归就业的比例较低,但大多数女性会在15年内回归就业。

在实证研究中,事件研究法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评估事件冲击的动态效应,帮助理解事件带来的中长期影响(Dobkin等,2018)。该方法最早被用于公司金融领域(Fama等,1969),随着因果识别研究的兴起,事件研究法被逐渐拓展至更多经济学领域,广泛应用于分析特定事件的动态影响(张子尧、黄炜,2023)。相比前述两个动态评估策略,事件研究法通过比较事件前后的自身差异来识别因果效应,其估计系数能够明确事件在不同时期产生的效应大小,并以动态效应图的形式直观展现出来。Kleven等(2019)首先利用事件研究法估计了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发现生育使丹麦女性的劳动参与下降20%。部分研究也用事件研究法估计了生育对中国女性的动态影响,但由于观测样本的限制,已有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等微观调查数据估计得到的动态效应波动较大,窗口期相对较短,且缺少稳健性检验(杨凡、何雨辰,2022;郭凤鸣、常慧,2023);使用中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进行拟事件分析的研究,由于人口普查年份不连续,只能用普查年份非生育女性来模拟非普查年份生育女性的缺失观测(Zhou等,2022),隐含了女性在不同年份间行为一致的较强假设。此外,现有分析使用的数据多在2018年以前,无法反映人口形势转变背景下的新变化。

生育后的职业转换将对女性就业质量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生育后就业中断的女性不仅要面临人力资本积累的中断(Aisenbrey等,2009),既有工作经验也可能遭遇贬值

(张抗私、王亚迪, 2021), 这将不利于其未来的职业发展。在自动化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 女性劳动者为兼顾家庭照料转移到非常规技能需求更低的职业, 会使其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Adda 等, 2017)。基于此, 本文不仅利用最新调查数据更为准确地识别了生育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 还考察了生育后女性在职业类型和不同技能需求的职业间的转换, 以此揭示生育后女性的职业转换趋势。

三、数据来源、变量说明与描述统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23 年第五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5)。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组织实施, 覆盖全国 8 个城市, 分别为上海、广州、沈阳、福州、武汉、西安、成都和贵阳, 代表中国不同地区典型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状况, 反映了最新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状况。

为说明数据代表性, 本文对比了 2020 年第七次人口普查(China Population Census, CPS)的城市人口和 CULS5 分年龄段不同性别的就业比例。如图 1 所示, 本文所用的抽样数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CULS5 和 CPS 城市人口的男性分年龄段就业比例非常接近, 而对于女性分年龄段的就业比例, CULS5 调查得到的就业比例更高。这是因为 CULS5 的调查城市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大城市, 女性就业比例会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大城市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成本, 女性面临更突出的“生育—工作”抉择困境, 这使本文分析也更具针对性。具体来看, 在 20~24 岁时, 男性和女性的就业水平相当, 尤其在 CULS5 代表的大城市中, 两者均在 60%左右。25~29 岁的男性就业比例明显提升, 其后各年龄组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就业比例。对女性而言, CPS 城市人口中 25~29 岁的就业比例已经开始显著低于男性, 但 CULS5 中这一年龄段女性的就业比例与男性没有较大差距。不过, 在 30 岁及以后, 两个数据所呈现的女性就业比例均降低到 70%附近。25~34 岁是中国女性进行生育的主要年龄段, 这初步显示了生育对女性就业所带来的负面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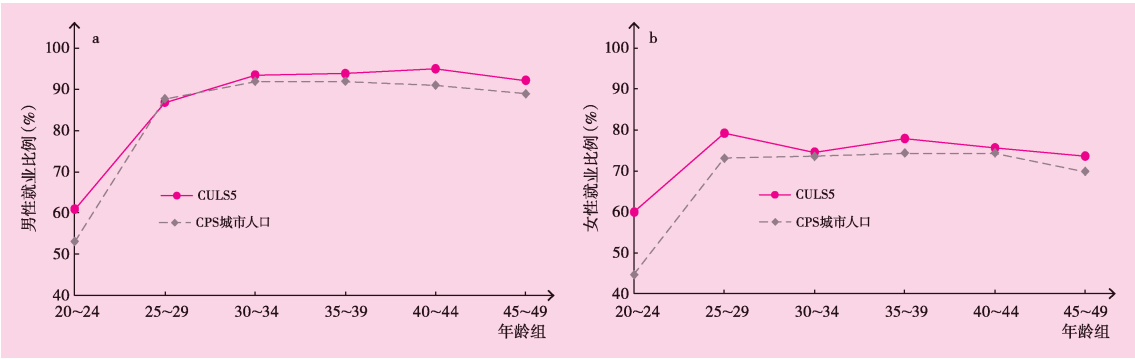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城市人口分年龄段就业比例

(二) 变量说明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个体就业状态和职业转换。其中,就业状态采用虚拟变量来衡量,即个体在观测年份是否工作,工作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在职业转换的衡量上,本文不仅关注个体在职业类型上的转变,还关注个体职业技能需求的变化。世界银行的STEP(Skills Toward Employability and Productivity)项目构建了一套测评职业技能需求的评价体系。本文基于CULS5中的STEP调查模块,利用工作任务框架(Autor等,2003; Acemoglu等,2011;都阳等,2017)计算了不同职业的技能需求。

这一分析框架依据常规(Routine)和非常规(Non-Routine)、操作(Manual)和认知(Cognitive)两个维度将工作任务的技能需求划分成不同类型。从第一个维度来看,工作任务或是按照既定的设计方案、程式化地解决,或是不确定程度较高,需要进行更多的即时处理和决策。从第二个维度来看,工作或是主要以体力或操作为主,或是主要以认知上的处理为主;认知处理还可以具体细分为主要侧重分析(Analytical)或互动交流(Interpersonal)。CULS5中劳动者工作任务特性的详细测度使本文能够计算出职业不同类型的技能需求水平,以此为基础计算常规任务指数(Routine Task-Intensity, RTI),从而综合反映职业的非常规技能需求情况(Autor等,2013)^①。RTI指数越高,说明这份职业常规技能需求越高;RTI指数越低,说明这份职业对非常规技能需求越高,越不容易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所替代。本文将RTI指数低于25%分位数的职业定义为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如科学研究人员、信息技术服务人员;其他职业则是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如纺织印染人员等、运输设备操作人员等。

为进行事件研究法分析,本文关键解释变量为一组刻画事件相对时间的虚拟变量,具体说明见后文的模型设定。事件相对时间为观测期距离一孩出生年份的差值,负值表示观测期在生育事件之前。考虑户籍类型、家庭规模和个人受教育程度可能影响个体就业,本文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以排除相关个体特征变化可能造成的干扰(黄炜等,2023)。

(三) 描述统计

为了描述近年来人口新形势下生育对就业的影响,本文基准回归使用的样本是CULS5调查中近10年有过一孩生育的家庭。对这些家庭中的女性和男性个体进行描述性统计的结果如表1所示,在调查样本中,女性生育一孩时的年龄平均为28.5岁,比丈夫小1.6岁左右,且在這些家庭中,女性处于就业状态的比例为73%,男性处在就业状态的比例为96%,前者明显低于后者。被访者在是否为非农户籍、家庭规模、受教育年限上和从事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比例上,并不存在较大的性别差异。为进行事件研究

① 该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RTI_i = \ln T_i^{RC} - \ln T_i^{NRCP} - \ln T_i^{NRCA}$, 其中 T_i^{RC} 、 T_i^{NRCP} 和 T_i^{NRCA} 分别表示职业*i*所需要的常规认知技能、非常规互动技能和非常规分析技能需求水平。

表 1 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变量说明	女性		男性	
		样本数	均值(标准差)	样本数	均值(标准差)
年龄		1480	34.44(4.55)	1401	35.95(4.85)
初育年龄		1480	28.47(4.03)	1401	30.05(4.30)
当前就业状态	工作 =1, 未工作 =0	1480	0.73	1401	0.96
事件相对时间	距离一孩出生的年数	1480	5.97(2.83)	1401	5.90(2.85)
非农户籍	是 =1, 否 =0	1480	0.70	1401	0.66
家庭规模	家庭人数(人)	1480	3.73(1.19)	1401	3.72(1.15)
受教育年限		1480	14.12(3.29)	1401	14.17(3.33)
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	是 =1, 否 =0	1082	0.32	1334	0.34

注：仅当前就业的受访者汇报了“是否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

分析,本文利用 CULS5 调查收集的工作史信息,包括各份工作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工作职业等信息,构建了受访样本生育前后就业状态的面板数据,共得到 32 540 个用于事件研究法的样本观测,其中男性样本观测和女性样本观测分别为 15 755 和 16 785 个。

四、模型设定与识别说明

(一) 模型设定

为识别生育事件对男女被访者就业的动态影响,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事件研究法的优势在于能够直观地反映事件发生前后个体的动态效应和组间差异,并能够清晰地用趋势图加以呈现。许多实证研究都采用这一方法来检验特定事件的动态影响(张子尧、黄炜,2023;黄炜等,2023)。就生育对就业带来的影响而言,本文借鉴 Kleven 等(2019)的模型设定,公式如下:

$$Y_{icat}^g = \sum_{r=-5, r \neq -1}^{r=10} \alpha_r event_r + \beta X_{icat} + \gamma_c + z_a + \mu_t + \varepsilon_{icat} \tag{1}$$

其中, Y_{icat}^g 表示性别为 g ($g = w$ 代表女性; $g = m$ 代表男性,用于对照分析)的个体 i 在城市 c 年龄 a 时间 t 的就业状态。 $event_r$ 为一组刻画事件相对时间的虚拟变量, r 为负值表示生育之前,正值表示生育之后;距一孩生育相对时间为 s 年的样本观测, $event_{r=s}$ 为 1, $event_{r \neq s}$ 为 0。参照事件研究法既有文献的做法,本文基准回归设定窗口期为事件前 5 年到后 10 年,将生育前 1 年(即 $r=-1$)作为基期,系数 α_r 度量了事件发生 r 年后就业状态相对于生育前 1 年的动态变化。 X_{icat} 是控制变量集合。由于研究选取的样本中所有个体均有过生育,加入个体控制效应会导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Borusyak 等,2024),因此本文参照 Kleven 等(2019)和黄炜等(2023)的处理,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γ_c ,并以 z_a 和 μ_t 这两个年龄和时间向量非参数化地控制生命周期趋势和时间趋势,两个向量分别代表一系列年龄和年份的虚拟变量。

上述模型的系数反映的是就业在该事件的不同相对时间相比于基期的变化,考虑到不同队列和不同特征的个体可能在就业趋势上有所不同,本文参照 Kleven(2022)的做法,用未生育的潜在就业水平作为反事实结果,计算估计结果相对反事实的百分比效应。这个百分比效应可以解释为女性生育情境下就业比例相比女性非生育情境下的变化,具体计算如下:

$$P_r^g = \frac{\hat{\alpha}_r}{E[\tilde{Y}_r^g | r]} \quad (2)$$

式(2)中, \tilde{Y}_r^g 表示劳动者在未生育情境下该期的反事实结果($event_r$ 均为0的结果), $\hat{\alpha}_r$ 是式(1)估计得到的效应, P_r^g 即生育对 g 性别就业在距离事件 r 年的百分比效应。

(二) 识别说明

识别生育对就业的影响,最理想的状况是利用随机试验来进行评估,不过这难以实现。研究者们利用混合性别偏好(Angrist等,1998)等工具变量来构造随机冲击,但这些研究的结论仍局限于特定群体。在研究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时,事件研究法能够很好地克服这一缺陷,虽然生育决策不是外生的,但在考察其对就业的影响时,只要生育前后影响劳动力供给状态的其他因素未发生明显变化,就可满足事件研究法的使用要求。具体而言,假设 $k_i=(k_{i0} \cdots k_{it} \cdots k_{iT})$ 表示个体 i 在观测年份内的生育选择路径, k_{it} 为0表示在第 t 年未生育, k_{it} 为1表示在第 t 年已生育, Y_{it} 表示个体的就业状态,则有:

$$Y_{it}=F(k_{it},x_{it},z_{it})=F[k_{it},x(k_{it},k_i,z_{it}),z_{it}] \quad (3)$$

式(3)将个体就业的决定因素分为3个部分,其中, k_{it} 表示个体 i 在第 t 年的生育状态, $x_{it}=x(k_{it},k_i,z_{it})$ 表示一组受到生育状态影响的就业决定因素,如收入预期等,其不仅受到当期生育状态的影响,还受到整个生育选择路径 k_i 以及其他就业决定因素 z_{it} 的影响; z_{it} 表示一组不受生育状态影响的就业决定因素,如年龄、受教育水平等。本文利用个体就业状态的前后变化来识别生育带来的影响。本文对样本的初步分析表明,就业状态的显著变化发生于生育之后。因此,可以将 k_{it} 视为一个事件冲击,既能直接影响就业状态,又能通过 x_{it} 对就业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假设生育事件发生前和发生后的时间分别为 t_- 和 t_+ ,本文捕捉到的效应即为:

$$E[Y_{it_+}-Y_{it_-}]=E\{F[1,x(1,k_i,z_{it_+}),z_{it_+}]\}-E\{F[0,x(0,k_i,z_{it_-}),z_{it_-}]\} \quad (4)$$

式(4)表明,只要影响就业状态的其他决定因素 z_{it} 在生育前后不发生较大变化,即 $E\{F[0,x(0,k_i,z_{it_-}),z_{it_-}]\} \approx E\{F[0,x(0,k_i,z_{it_+}),z_{it_+}]\}$,事件发生前的就业状态就可以视为事件发生后且个体未生育的反事实结果,直接进行比较就可以捕捉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影响。这一假设在短期内基本成立;但在长期内, z_{it} 并非保持平稳,通过回归控制 z_{it} 可以放松这一假设。长期来看,个体就业的决定因素主要受到年龄和时代观念变化的影

响,借鉴 Kleven 等(2019)的方法,本文进一步加入年龄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等来控制长期的变化趋势,从而减小长期效应估计可能存在的偏误。

由此,本文可以更准确地区分事件研究法所估计的效应,事件研究估计出的动态效应仅是生育带来的育后效应,包括 k_{it} 对 x_{it} 产生的影响,即女性在生育之后做出的改变(如改变就业状态或改变职业)。估计的效应并不包含生育对女性带来的育前效应,如女性为预期中的母亲角色提前做的准备,即假设 x_{it} 并不影响 z_{it} 。因此,就生育带来的整体影响而言,本文得到的动态效应有所低估,只体现已生育女性的育后效应,若考虑生育对女性带来的育前效应,实际影响会更大。

五、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

(一) 基准结果

本文利用 CULS5 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代表性城市中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图 2 是基于式(1)的基准结果,每个点代表与基期(生育前 1 年)相比,生育导致劳动者就业下降的百分比。针对男性的对照分析显示,生育对男性就业比例并没有显著影响。生育后,男性就业几乎没有变化。但是,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则十分明显,在生育当年,女性就业比例下降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生育后 3 年内相应就业比例下降幅度一直维持在 15 个百分点左右。在生育后的 4~6 年里,孩子进入幼儿园后,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才开始缓解,直到生育 8 年后,这一影响在 95%的水平上不再显著异于零。在生育之前,男性和女性均有就业比例增加的事前趋势,这可能反映了个体在生育前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性在生育前 1 年的就业就已经出现明显下降,这可能是女性出于备孕的需要中断就业。图 2 估计的生育对女性劳动就业影响的动态效应与国际经典文献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中国女性面临的“生育惩罚”符合一般国际经验。

表 2 是与图 2 相对应的回归结果,为更清晰地反映生育影响女性就业的动态效应,本文对事件发生后不同时期的动态效应进行平均处理。表 2 报告了生育当年、1~3 年、4~6 年、7~10 年的平均百分比效应,分别作为生育对劳动者当期、短期、中期、长期的就业影响。与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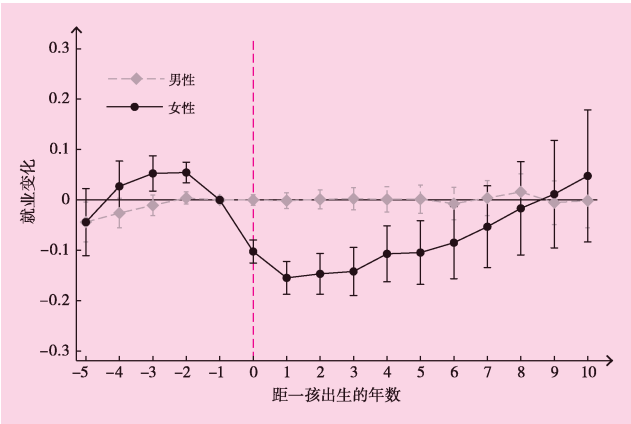


图 2 生育影响男性和女性就业的动态效应估计结果

注:图中估计点上下线段为 95%置信区间,采用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下图同。

2 结果一致,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各期系数均不显著,说明在不同设定下生育均不会对男性就业产生显著影响。模型 3 和模型 4 说明生育主要影响女性就业,且主要集中于生育后的短期内,随生育后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弱。从模型 4 可以看出,非农户籍和家庭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个体受教育年限对就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排除控制变量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后,相比生育前 1 年而言,孩子出生使女性就业当期下降了 10.2 个百分点,在短期(1~3 年)下降了 14.7 个百分点;在中期(4~6 年)负面影响有所减弱,女性就业比例下降了 9.8 个百分点;在长期(7~10 年)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基本消失。

总体来看,生育对中国城市居民就业的负面影响集中于女性,且主要发生在孩子还未进入学龄阶段、更多由家庭照料的前 3 年。随着孩子逐步进入教育体系,得到更多的社会养育支持,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面影响也在逐渐减弱。

表 2 生育对就业的动态影响

	男性		女性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当期(生育当年)	-0.002(0.005)	-0.000(0.005)	-0.110*** (0.012)	-0.102*** (0.012)
短期(第 1~3 年)	-0.004(0.009)	0.001(0.009)	-0.166*** (0.020)	-0.147*** (0.020)
中期(第 4~6 年)	-0.010(0.014)	-0.002(0.014)	-0.132*** (0.031)	-0.098*** (0.032)
长期(第 7~10 年)	-0.009(0.020)	0.003(0.020)	-0.059(0.049)	-0.001(0.050)
非农户籍		0.022(0.013)		0.005(0.021)
家庭规模		-0.004(0.005)		-0.001(0.007)
受教育年限		0.005** (0.002)		0.027*** (0.003)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15755	15755	16785	16785
R ²	0.056	0.070	0.064	0.100

注:模型均控制了年龄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对比基期为生育前 1 年,括号内为聚类到个体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和 *** 分别表示在 10%、5% 和 1% 的水平上显著。如无其他说明,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加入更多控制变量

由于所有样本均为处理组,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会造成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说明其他变化对本文估计结果并未造成干扰,本文又加入了“城市—时间”固定效应,以控制各城市不同变化趋势带来的影响(如地级市的人口生育政策)。图 3a 表明,控制这一效应后,各期的效应大小和显著性水平仍基本一致,差异并不大。

2. 调整窗口期

为避免窗口选择导致的估计偏差,本文还将样本限定在生育前 3 年至后 5 年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图 3b 所示。比较生育前 3 年到生育后 5 年的效应可以看出,两者差

距很小,窗口期选择对本文的估计结果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3. 排除观测期内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冲击的影响

本文基准回归所用的样本包含了 2020 年及之后的样本,而 2020 年及之后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带来的冲击可能对个体的生育及就业决策产生影响,从而对结果产生干扰。为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取 2004~2019 年的样本观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图 3c 所示。可以看出,在 2019 年及以前,生育对就业的动态影响与基准回归结果几乎一致,相关冲击并不影响本文的结论。

(三) 异质性分析

1. 区分受教育程度

受教育水平是影响女性就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低教育水平女性选择不就业的机会成本更小,因而在生育后短期内更倾向于退出劳动力市场。为说明生育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就业动态影响的差异,本文以是否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将女性被访者划分为两组(分别简称为高学历女性和低学历女性),分别拟合模型,回归结果如图 4a 所示。相较于高学历女性,低学历女性在生育后选择不就业的可能性更高,在生育后 3 年内就业比例下降超过 20 个百分点。不过,随着孩子开始接受义务教育,低学历女性重新选择就业的趋势也更明显,在生育后第 9 年其就业水平已经略高于生育前的水平。因此,从短期来看,生育对女性就业的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低学历女性;但从长期来看,由于低学历女性在子女成长过程中面临更大的经济负担,其就业恢复更为迅速。由此,生育对不同受教育程度女性就业的影响趋于收敛。

2. 区分初育年龄

生育对就业的影响也可能因初育年龄的不同而异。一般而言,女性在职业发展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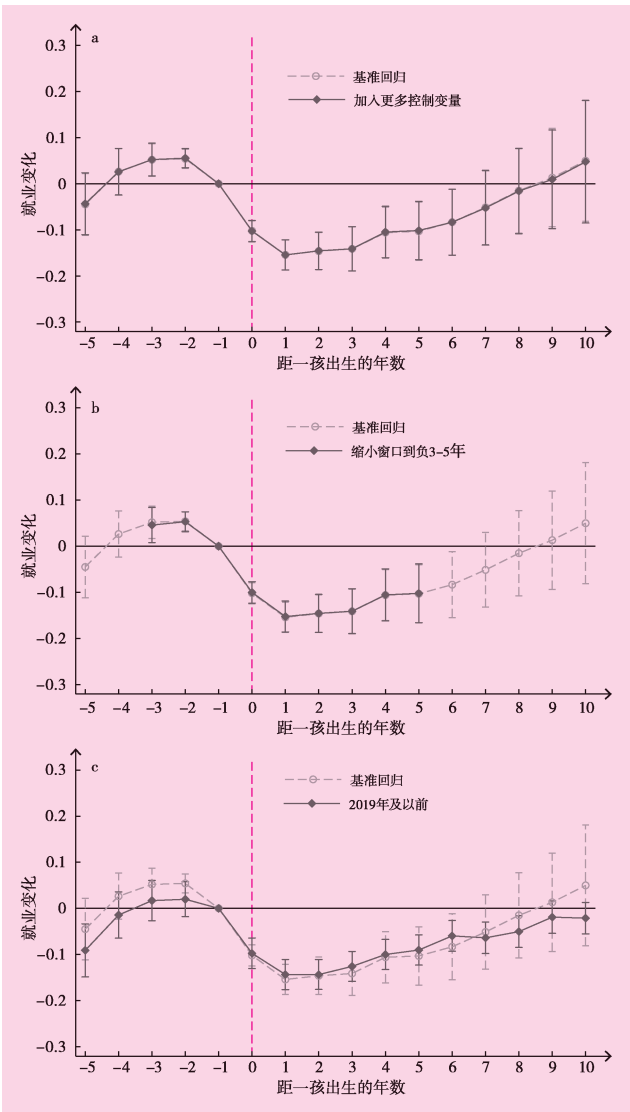


图 3 稳健性检验

(即年龄较低时)选择生育损失的潜在收入较少,但人力资本积累中断又会对未来的技能提升和收入增长产生负面影响。本文所观测样本中,女性初育年龄的均值和中位数都在 28 岁左右,以此为切点将被访女性划分为初育年龄较低(初育年龄小于或等于 28 岁)和初育年龄较高(初育年龄大于 28 岁)两组来进行异质性分析。从图 4b 的结果可以看出,对初育年龄较高的女性而言,生育后 0~3 年内就业比例下降在 10 个百分点左右,且在生育后 6 年(即孩子进入小学时)起恢复到了生育前的就业水平,甚至更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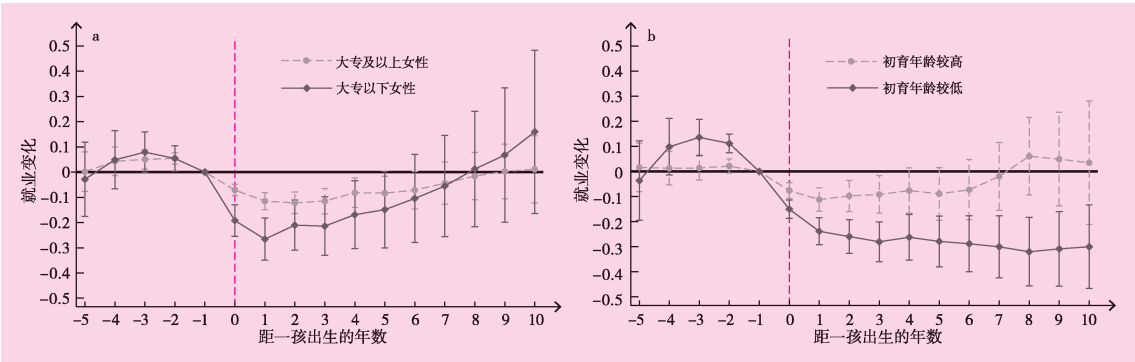


图 4 区分受教育程度和初育年龄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对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生育后 0~3 年内就业比例下降均超过 20 个百分点。由于这一群体更缺少有效的人力资本积累,在生育 3 年后就业的负面冲击仍在不断加剧,其就业比例下降幅度可达 35 个百分点左右。这说明初育年龄较高的女性在生育后就业的负面冲击相对较小,而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在生育后不再就业的可能性更大,且在较长期内也没有恢复到生育前的就业水平。考虑到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受教育水平也相对更低,工作经验积累少,在生育后往往难以重新进入劳动力市场。对此,有必要通过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来帮助有就业意愿的女性重新就业,这对进一步释放劳动供给潜力具有重要意义。

3. 区分户籍性质与类型

户籍性质也是影响女性生育和就业的重要因素。本文从是否为农业户籍、是否为外来人口两个维度讨论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差异性影响。其中,本地人口是指户籍所在地为本市的个体,外来人口是指户籍登记地在其他地市的个体,图 5a 和图 5b 分别是基于是否为农村户籍和是否为外来人口的分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从短期来看,生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和外来女性就业的影响更大,而从长期来看,她们恢复到生育前的就业水平也更快。这是因为农村户籍和外来女性更可能从事低收入就业,较低的机会成本使她们更可能选择短期内照顾孩子而退出就业。随着孩子的成长及教育支出的上升,她们也更积极地回归就业来获得收入。

对比图 5a 和图 5b 可以看出,农村户籍和外来人口、非农户籍和本地人口在生育的

动态效应变化模式相似。生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要略大于外来女性,对本地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低于非农户籍女性。对于外来非农户籍女性,生育对其就业的影响与对本地户籍女性的动态影响趋势相似,但负面影响更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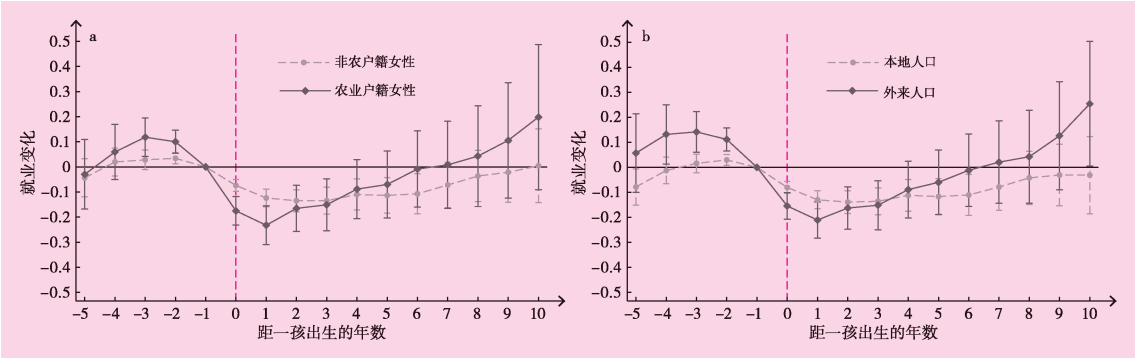


图 5 区分户籍性质与类型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4. 区分有无隔代照料资源

从现实来看,中国家庭代际联系更为紧密,老年人极可能参与到孙辈的抚养照料中,这可能会减轻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既有研究将老年人协助子女照料孙辈的家庭安排称为隔代照料(邹红等,2018)。CULS5 对有 6 岁及以下儿童的被访者询问了祖辈参与照料的时间,本文因而区分有无隔代照料资源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图 6 所示。有隔代照料资源的女性在生育后 0~3 年内就业比例下降更少,说明祖辈参与照料有助于缓解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短期冲击。但在孩子 3 岁以后,这一缓解作用不再显著,反而是没有隔代照料资源的女性就业比例相对提高。这可能是因为,隔代照料主要缓解婴幼儿阶段的照料压力。随孩子进入教育阶段,不再需要全天候的陪伴照料,没有隔代照料的家庭也更倾向于返回劳动力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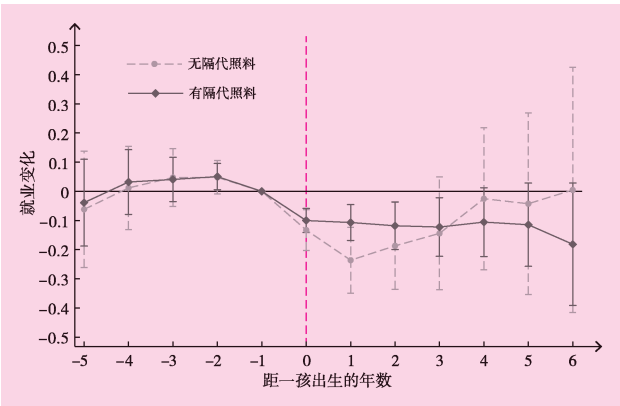


图 6 区分有无隔代照料资源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六、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

前文实证检验了生育对女性是否就业的动态影响,但生育后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未必返回生育前的职业,生育带来的职业类型转换对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更加深

远。这不仅会拉大性别之间、生育和未生育女性之间的人力资本积累差距,还可能加剧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就业的性别歧视(Aisenbrey等,2009)。生育后的职业转换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开始新的人力资本积累过程,工资增长和职业晋升机会都可能受到负面影响。女性在生育后由于需要兼顾家庭照料,可能更少选择时间投入较大的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Goldin,2014)。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变革趋势下,重复、可编码的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在新技术影响下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Acemoglu等,2020)。对此,本部分进一步从职业类型和职业技能需求角度探究生育对女性就业的动态影响。

(一) 女性就业类型变化的描述分析

为直观说明不同就业类型的变化,表3展示了不同职业分类标准下女性在生育前后4个时间点的就业占比。首先将职业划分为专业技术型职业、社会服务型职业和其他职业3大类,专业技术型职业的正规化程度较高,但工作灵活性程度较低,需要较密集的时间投入。可以看出,生育前1年的女性样本中,从事专业技术职业的占比为39.55%,生育当年相应比例略微下降,生育3年后下降到36.90%,随后重新回到生育前1年的水平或更高;相应比例在生育6年后的观测样本中达到40.80%。社会服务型的就业比例在生育当年相对于生育前1年下降5个百分点,生育后就业比例的上升慢于专业技术型职业。这说明,专业技术型职业的女性劳动者在生育后退出就业的概率更低,回到原来职业的比例也更高,而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则相反。

从职业技能需求角度来看,本文以RTI指数低于25%分位数的职业为非常规技能型职业,在生育前1年的观测中,从事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和常规技能需求职业的比例分别为24.53%和49.39%,生育后相应职业的就业比例均有下降。考虑到不同观测期就业类型的描述分析混杂了干扰因素,无法说明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影响,本文分别以

生育前从事不同职业类型的样本为研究对象,通过事件研究法识别生育对劳动者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

(二) 生育对女性职业类型转换的动态影响

为研究生育对职业种类转换的影响,本文分别对生育前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和

表3 生育前后女性不同就业类型占比 单位:%

分 类	生育前1年	生育当年	生育3年后	生育6年后
按职业类型分				
专业技术型职业	39.55	39.06	36.90	40.80
社会服务型职业	31.96	26.90	28.14	28.60
其他职业	3.35	3.00	5.80	3.28
按职业技能需求分				
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	24.53	23.76	23.44	23.80
常规技能需求职业	49.34	45.21	44.44	48.89
未就业	26.14	31.03	32.12	27.32

注:专业技术型职业和社会服务型职业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进行分类,专业技术就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社会服务型就业包括商业、服务业人员。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是RTI指数低于25%分位数的职业。

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劳动者进行事件研究,将被解释变量定义为是否仍从事原来的职业类型或转换到其他职业类型,模型设定与式(1)设定相同,结果如表4所示。对生育前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的样本而言,模型5显示生育使女性短期内从事该职业的比例显著下降,但随后这一负面影响不断减小,到长期内不再有影响显著。模型6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说明生育前从事专业技术型职业的劳动者在生育后并未转移到其他类型职业。对生育前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样本而言,模型7估计的结果显著为负,且绝对值比模型5要大,说明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在生育后更倾向于退出就业,且在长期也未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模型8则说明生育之后,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在中长期重新返回劳动力市场时更多转移到了专业技术型职业。

上述回归结果表明,专业技术型职业受生育的负面影响较小,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也会回到原来的职业类型,不会转移到社会服务型职业,而从事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不仅更容易因生育中断就业,在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后还更倾向于转移到专业技术型职业。这可以从以下角度来加以解释。其一,从职业正规化程度的差异来看,专业技术型职业的正规程度和保障水平普遍较高,女性因生育退出职业的比例更低,而社会服务型职业劳动者因缺乏完善的职业保障而面临更高的职业退出风险。其二,从人力资本折旧预期来看,专业技术型职业的人力资本专用性更强,职业转换的机会成本更高,因而女性在生育后重新选择职业时更倾向于选择原有职业。其三,从生育对就业抑制和促进效应的相对强弱来看,随着子女逐步进入学龄阶段,生育对女性从事时间密集型职业的抑制作用减弱,同时支出扩大带来的促进效应增强了女性从事更高收入的动机,因而促进了部分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女性转移到时间投入与工资报酬都更高的专业技术型职业。由此可知,为减轻女性因生育中断就业带来的损失,应采取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社会服务型职业的就业保障制度建设,提升工作的生育友好程度。

(三) 生育对女性所从事职业的技能需求的动态影响

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的工作经验积累使劳动者在面对自动化替代时更具优势,生育如何影响女性职业技能积累值得关注。为检验生育对女性不同技能需求职业间转换的影响,本文以是否从事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及所从事职业的RTI指数为被解释变量,对生育后仍就业的女性样本进行事件研究分析。职业的RTI指数越低,该职业对常规技能需求越低,非常规技能的需求越高。表4模型9报告了以是否为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相比生育前1年而言,生育对女性从事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并随时间不断增强。为进一步分析生育前后女性从事职业的常规技能需求变化,表4模型10报告了以RTI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随事件发生时间不断增大,说明女性生育后从事的职业更倾向于使用常规技

能需求,非常规技能需求越来越低,即生育造成了女性劳动者从非常规技能人力资本积累转移到常规技能人力资本积累。

表 4 生育对女性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

生育前就业类型	专业技术型职业		社会服务型职业		非常规技能需求职业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仍从事原来职业类型	转换到社会服务型职业	仍从事原来职业类型	转换到专业技术型职业	仍从事原来职业类型	从事职业的 RTI
当期(生育当年)	-0.046*** (0.010)	0.001 (0.003)	-0.145*** (0.018)	0.010* (0.005)	-0.052*** (0.013)	0.009 (0.006)
短期(第 1~3 年)	-0.102*** (0.018)	0.005 (0.009)	-0.204*** (0.025)	0.013 (0.008)	-0.121*** (0.023)	0.037** (0.016)
中期(第 4~6 年)	-0.086*** (0.031)	0.020 (0.016)	-0.214*** (0.042)	0.054*** (0.019)	-0.129*** (0.042)	0.092*** (0.033)
长期(第 7~10 年)	-0.057 (0.052)	0.040 (0.033)	-0.185*** (0.070)	0.113*** (0.040)	-0.148* (0.078)	0.145** (0.059)
观测值	6996	6996	5660	5660	4358	3784
R ²	0.084	0.020	0.086	0.072	0.077	0.074

注:各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年龄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城市固定效应,对比基期为生育前 1 年,其他同表 2。

七、结论和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第五轮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CULS5)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估计了生育对中国城市女性就业和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第一,生育对就业影响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女性劳动者。生育当期女性就业率下降约 10 个百分点,三年后降幅达 15 个百分点。随着孩子进入学龄阶段,负面影响逐渐减弱。第二,受教育程度较低、农村户籍、外来人口、无隔代照料的女性受影响更大,短期内因生育选择不就业的比例更高,但长期会恢复到生育前的就业水平。不过,初育年龄低的女性因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负面冲击在生育 3 年后仍在加重。第三,生育还会影响女性的职业转换。专业技术型职业在生育后倾向于返回原来的职业类型,而社会服务型职业更易因生育中断就业,重新回到劳动力市场时也更倾向于转移到专业技术型职业。女性生育后从事职业的非常规技能需求也显著减小,这意味着在技术不断变革的趋势下,将承担收入下降和人力资本加速折旧的双重风险。

在中国人口新形势下,为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不能仅从提高生育率的角度来考虑生育支持政策,还应充分考虑生育对女性就业带来的潜在负面冲击。本文揭示了人口结构转变背景下生育对女性就业和职业转换的动态影响,对全面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具

有以下政策启示。

首先,应建立全面的托育体系,将婴幼儿早期照料纳入公共服务。本文结果表明,孩子0~3岁是生育对女性就业影响最大的阶段,也是社会照料缺失期。进一步优化托育服务的可及性、服务质量和价格,将有助于减轻女性的照料负担,促进生育和就业。同时,婴幼儿时期是人力资本投资回报最高的时期,增强学前教育的普及普惠属性,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实施免费学前教育,不仅能有效减轻女性的养育压力,还能带来更高的社会收益。

其次,应强化生育与就业政策的针对性。因生育退出就业的往往是人力资本水平较低、就业质量不高的女性,尤其是初育年龄较低的女性,生育对她们就业的长期影响一直存在。因此,一方面要通过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来为这些群体提供更全面的社会支持,减轻生育对其生活和就业带来的压力。另一方面,应针对性地为其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支持,以弥补人力资本积累中断的负面影响,帮助她们重返劳动力市场。

最后,应进一步促进生育友好、机会平等的职业体系发展,让女性生育后有更加多样公平的职业选择。建议通过弹性工作方式和家庭友好型职业体系建设,让女性劳动者不再局限于特定职业来兼顾家庭照料责任。应特别关注女性在技术变革背景下的适应能力和竞争力的提升,实现经济发展与性别平等的良性互动。

参考文献:

1. 都阳等(2017):《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工作任务与技能需求》,《劳动经济研究》,第3期。
2. 郭凤鸣、常慧(2023):《二胎生育对女性就业和工作时间的动态影响——基于事件研究法的分析》,《人口学刊》,第6期。
3. 黄乾、范子昂(2023):《生育支持政策提升了女性生育意愿吗?——基于企业—员工匹配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4. 黄炜等(2023):《退休制度、劳动供给与收入消费动态》,《经济研究》,第1期。
5. 贾男等(2013):《工资率、“生育陷阱”与不可观测类型》,《经济研究》,第5期。
6. 刘金菊(2020):《中国城镇女性的生育代价有多大?》,《人口研究》,第2期。
7. 罗楚亮等(2019):《行业结构、性别歧视与性别工资差距》,《管理世界》,第8期。
8. 石智雷、王璋(2023):《公共托幼服务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的实证检验》,《中国人口科学》,第3期。
9. 鄢伟波、安磊(2021):《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为何降低:来自流动人口的证据》,《世界经济》,第12期。
10. 杨凡、何雨辰(2022):《中国女性劳动供给中的“母职惩罚”》,《人口研究》,第5期。
11. 杨一纯等(2023):《中国女性初育后的长期就业轨迹——基于序列分析的探索》,《社会》,第5期。
12. 於嘉、谢宇(2014):《生育对我国女性工资率的影响》,《人口研究》,第1期。
13. 詹鹏等(2021):《城镇女性劳动供给长期趋势研究:来自教育扩张和生育行为的解释》,《中国工业经济》,第8期。

14. 张川川(2011):《子女数量对已婚女性劳动供给和工资的影响》,《人口与经济》,第5期。
15. 张抗私、王亚迪(2021):《生育对已婚女性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公共管理评论》,第3期。
16. 张子尧、黄炜(2023):《事件研究法的实现、问题和拓展》,《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9期。
17. 邹红等(2018):《隔代照料与女性劳动供给——兼析照料视角下全面二孩与延迟退休悖论》,《经济学动态》,第7期。
18. Abbott A., Hrycak A. (1990), Measuring Resemblance in Sequence Data: An Optimal Matching Analysis of Musicians' Career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6(1):144-185.
19. Acemoglu D., Autor D.H. (2011), Skills, Tasks and Technologies: Implications for Employment and Earnings. *Handbook of Labor Economics*. 4b:1043-1171.
20. Acemoglu D., Restrepo P. (2020), Robots and Jobs: 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8(6):2188-2244.
21. Adda J., Dustmann C., Stevens K. (2017), The Career Costs of Childr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25(2):293-337.
22. Aisenbrey S., Evertsson M., Grunow D. (2009), Is There a Career Penalty for Mothers' Time Out? A Comparison of Germany, Sweden and the United States. *Social Forces*. 88(2):573-605.
23. Angelov N., Johansson P., Lindahl E. (2016), Parenthood and the Gender Gap in Pay.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34(3):545-579.
24. Angrist J.D., Evans W.N. (1998),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Labor Supply: Evidence from Exogenous Variation in Family Siz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3):450-477.
25. Autor D.H., Dorn D. (2013), The Growth of Low-Skill Service Jobs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the US Labor Marke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3(5):1553-1597.
26. Autor D.H., Levy F., Murnane R.J.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4):1279-1333.
27. Becker G.S. (1981), *The Economics of the Famil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8. Blau F.D., Lawrence M.K. (2017), The Gender Wage Gap: Extent, Trends, and Explana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5(3):789-865.
29. Borusyak K., Jaravel X., Spiess J. (2024), Revisiting Event-Study Designs: Robust and Efficient Estim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91(6):3253-3285.
30. Dobkin C., Finkelstein A., Kluender R., et al. (2018),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Hospital Admiss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8(2):308-352.
31. Fama E.F., Fisher L., Jensen M.C., et al. (1969), The Adjustment of Stock Prices to New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0(1):1-21.
32. Feng S., Hu Y., Moffitt R. (2017), Long Run Trends in Unemployment and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Urba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5(2):304-324.
33. Flory J.A., Leibbrandt A., List J.A. (2015), Do Competitive Workplaces Deter Female Workers? A Large-Scale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 on Job Entry Decisions.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2(1):122-155.
34. Goldin C. (2014), A Grand Gender Convergence: Its Last Chapter.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4):1091-1119.

35. Kleven H., Landais C., Sogaard J.E.(2019), Children and Gender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Denmark.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4):181–209.
36. Kleven H.(2022), The Geography of Child Penalties and Gender Norms: A Pseudo–Event Study Approach.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30176.
37. Xiao S., Asadullah M.(2020), Social Norms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in China. *Feminist Economics*. 26(4):114–148.
38. Zhou X., Ye J., Li H., et al.(2022), The Rising Child Penalty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76:101869.

The Dynamic Effects of Childbirth on Female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Switching: Findings Using the Event Study Method

Qu Xiaobo Wang Xunyu

Abstract: Based on the latest data of China Urban Labor Survey, this paper uses the event study to identify the dynamic effect of childbirth on the employment of Chinese urban women, and empirically analyzes the impact of childbirth on the occupational switching of female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types and skill deman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negative effect of childbirth on female employment i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rst few years following childbirth. The proportion of female employment decreases by 15 percentage points on average in the first three years after giving birth a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before childbearing, which is eased gradually as the child enters schooling ages, and recovers to the pre–childbearing level eight years after the childbirth. Secondly, the short–term negative impact of childbirth on female employment is greater for those with low education levels, no grandparental care, rural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migrant workers, bu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long term; for women who have their first child at an early age, the negative impact on their employment in the long term cannot be eliminated. Thirdly, the degree of occupational switching in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employment is lower, and social service employment is more likely to be affected by childbirth, with females more likely to switch to jobs with lower non–standard job skills requirement after childbirth,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female laborers continuously accumulating human capital to meet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new technological changes. The conclusion of this paper is helpful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act of childbirth on female employment from a dynamic perspective, and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balancing fertility support and female labor market development.

Keywords: Female Employment; Occupational Switching; Fertility Penalty; Event Study

(责任编辑:许 多)